

# 流产的毛蒋会晤： 1942—1943 年国共关系再考察

金以林

**内容提要**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共关系逐步由合作走向摩擦，前后经历过三次“国民党反共高潮”：第一次是1939年12月爆发的山西新军事件；第二次是1941年1月的皖南事变；第三次是1943年5月，国民党准备闪击延安。中共党史著作对此多有叙述，然而往往没有注意到，在第二次和第三次“反共高潮”前后两年多期间，国共关系一度相当缓和，且有过一段较为密切的接触，特别是1942年这一年，蒋介石主动提出要与毛泽东会晤。为此毛泽东多次致电在重庆的周恩来，希望面对蒋介石会商国共关系，后因周恩来的反对，而改派林彪到重庆见蒋介石。最终双方因差距过大，谈判不了了之。此后不久，随着共产国际的解散，国共双方又展开了新一轮的对抗。

**关键词** 毛泽东 蒋介石 抗战 国共关系 “反共高潮”

—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共两党关系日趋冷淡，前后出现三次“国民党反共高潮”。毛泽东在处理这三次事件中，始终秉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态度<sup>①</sup>并采取完全不同的方法相对应，始终赢得了国共对抗中的主动权。

第一次是山西新军事件。1939年12月，阎锡山命令他长期控制的山西旧军进攻抗战中新成立的山西新军。表面上山西新军归阎指挥，事实上是由中共领导的一支武装。此时，阎锡山并没有公开反共，晋西的摩擦是以新旧军冲突的形式出现的。对此，毛泽东利用这一点，明确提出：新军可公开将旧军视为对抗日的叛变，“对叛军进攻绝不退让，坚决有力地给予还击，并立即由新派提出反对叛军的口号，但不要反对阎”。“在新军内部迅速巩固党的领导，不可靠者断然撤换”。<sup>②</sup>同时，毛泽东要求八路军必须支持新军，但不必随新军一起提反对叛军的口号。

<sup>①</sup> 毛泽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1940年3月11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50页。

<sup>②</sup> 《毛泽东王稼祥致朱德左权彭德怀电》（1939年12月6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48页。

在处理这次事件时,毛泽东采取的对策是军事上坚决反攻,政治上不仅不提一句反对国民党,甚至都不公开指名批阎锡山,而是要“在拥阎之下反对阎”。<sup>①</sup>最终逼迫阎锡山直接与中共谈判解决,并重新划分彼此防地。晋西南为阎锡山活动区域,晋西北归八路军。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也向中共表示:“不再提八路军扩军人事归国民党中央管理。”毛泽东事后评价这次反摩擦的成绩时表示:“最大的胜利就是防线的划定,现在我们党的力量可以起半决定作用。”<sup>②</sup>

第二次是皖南事变。这次“反共高潮”同前次最大的不同是,国民党中央军攻打中共直接指挥的新四军,且中共损失惨重。有关皖南事变的研究成果非常多,这里不再赘述。以中共当时的实力,不可能同国民党彻底决裂。因此,毛泽东采取的对策是:“政治上取攻势,军事上暂时仍取守势”<sup>③</sup>,利用国内外的舆论共同发酵,赢得了人心,彻底摆脱了国民党军令上的限制,很快重建新四军,同八路军一道得以迅速发展壮大。同时,中共只将制造皖南事变的祸首定为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始终未正面攻击蒋介石。毛泽东还特意致电刘少奇、陈毅等指示:“我们暂时不公开提出反蒋口号,而以当局二字或其他暗指方法代替蒋介石的名字。”<sup>④</sup>

蒋介石在国内外压力下,被迫命张冲与周恩来谈判解决皖南事变。为此,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提出“于十八集团军之外,再成立一个集团军,共应辖有六个军”等12条办法。<sup>⑤</sup>3月14日,蒋介石主动约见周恩来表示:“两个多月未见,由于事忙。参政会开会前,因不便未见。”“现在开完会,情形和缓了,可以谈谈”。期间,蒋介石始终对新四军事件有意置而不答。当周恩来提到防地和扩军问题时,蒋介石自知理亏,只是含糊其辞地说:“只要听命令,一切都好说,军队多点,饷要多点,好说。”<sup>⑥</sup>既然蒋介石开口“军队多点,饷要多点,好说”,中共就可以合法地放手扩军,中共根据地的发展更快了。

1941年7月12日,苏联和英国签订《关于在对德战争中共同行动的协定》。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英苏协定将成为世界政治的枢纽,美国在政治上只能跟着这条路线走,不能操纵一切了。英苏协定将影响日本,增加其顾虑,亦将影响中国,促成中苏、国共的好转。”为此毛泽东指示周恩来:“关于见蒋,张冲既两次来催,似可一见,看他说些什么,如能释放叶挺及发八路军几个月饷,国共关系即可转圜,但仍不可求之过急。”<sup>⑦</sup>正如毛泽东所预料的那样,7月19日,国民党因“国际环境关系”被迫向中共提出“中央提示案”(即皓电):允许“18GA(即第十八集团军——引者注)编为二军六师(每军三师,每师三团)及一独立旅(两团制,不准有支队)”,陕甘宁边区“区域”共辖18个县,同时又设定诸多限制。<sup>⑧</sup>而此时中共根据地的区域和军队数量都已大大超出这一范围。22日,毛泽东复电周恩来表示:“目前还谈不到对十二条的让步问题,仅在国民党真有好转诚意时,我

①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39年12月23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53页。

② 《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1940年3月23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182页。

③ 《毛泽东致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电》(1941年1月20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262页。

④ 《毛泽东王稼祥朱德致刘少奇陈毅张云逸等电》(1941年1月28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263页。

⑤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周恩来董必武电》(1941年2月28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279页。

⑥ 《周恩来关于同蒋介石谈判问题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央档案馆编:《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235页。

⑦ 《毛泽东复周恩来电》(1941年7月1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312页。

⑧ 《与中共谈话要点案》,另可参阅《参谋总长何应钦呈蒋委员长就林彪周恩来所提要求四项排列并附具研究意见列表呈呈监核》(1942年12月31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5编,“中共活动真相”(4),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5年版,第251—252、244—245页。

们才准备谈判具体条文(对某几条可以商量)。”<sup>①</sup>故周恩来未接受国民党的要求。

从第二次到第三次“反共高潮”之间,也就是1941年3月到1943年7月的两年多期间,国共关系相对稳定。特别是到了1942年夏,国共两党一度重新开启谈判,甚至蒋介石主动提出要见毛泽东。这又是为什么?

这期间最主要的一个因素是国际形势发生了异常激烈的动荡和变化。特别是在1941年,接连发生了两件震动世界的大事:一是在欧洲战场,6月德国突然进攻苏联;二是在亚洲太平洋战场,12月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这两场大战根本改变了世界的政治格局和力量对比,同时也对国共关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942年元旦,由美、英、苏、中四国领衔,参加反对德、意、日作战的26国签署《联合国家宣言》,标志着反对轴心国的盟国阵线正式形成,从此中国成为“四强”之一。随着美、英、苏三国团结的增强,直接影响着蒋介石的对内政策。此时,美、英两国都不希望中国发生内战,美国甚至进一步表示:它所给予蒋介石的援华军火,不得用于反共。

这年4月,日本占领缅甸,切断了英美向中国输送军火物资的唯一通道——滇缅公路。此时,连接中国与外部世界的通道就只剩下经新疆通往苏联的陆路交通。在重庆的周恩来曾向毛泽东汇报:“美对苏关系已转好,反苏力量日减。”<sup>②</sup>而一向亲苏的“新疆王”盛世才自苏德战争爆发后,逐步改变其原有的亲苏政策,开始向国民政府表示效忠。为了能顺利解决新疆问题,保持中苏交通,蒋介石不得不考虑要同苏联和中共改善关系,决定:“对匪应随机处置,不宜整个破裂,以此时无彻底解决之可能;新疆方针,行使其接受驻军条件。”<sup>③</sup>或许是受蒋介石之命,蒋经国在此期间赴西安同手握重兵、包围延安的胡宗南会商中共问题时,指出:“陕北问题应即解决,先从政治入手,地方入手。”<sup>④</sup>

与此同时,中共也同样迫切需要摆脱困境,其最主要的因素就是经济上面临极大的困难。自1940年2月,周恩来由苏联养病回国途经西安时,向蒋鼎文、胡宗南领取过部分八路军军饷后,就再没有从国民政府手中领过一分军饷。<sup>⑤</sup>而皖南事变后的一年是“边区财政经济困难关键的一年”,毛泽东甚至认为:就现实状态,即不发生大的突变来说,经济建设一项乃是其他各项的中心,有了吃穿住用,什么都活跃了。<sup>⑥</sup>

1941年6月的一天,边区政府开会讨论征粮时,天下大雨,一位与会县长被雷击死,有位农民就说:“唉呀,雷公为什么没有把毛泽东打死呢?”当时保卫部门要把这位农民当作反革命处理,被毛泽东阻止。他公开表示:“其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征公粮太多,有些老百姓不高兴。”<sup>⑦</sup>为了生存,毛提出了两个解决办法:一是大生产运动;一是精兵简政。大致到1942年底,边区经济困难才略有好转。为了缓解边区的困难,这年12月,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还批评了那种不顾环境需要,单纯强调政府应施“仁政”的观点:“为了抗日和建国的需要,人民是应该负担的,人民很知道这种必要性。在公家极端困难时,要人民多负担一点,也是必要的。”同时,他也反对“不顾人民困难,只

① 《中共中央书记处复周恩来董必武电》(1941年7月22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314页。

② 《周恩来致毛泽东电》(1942年6月10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47页。

③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2年3月19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藏,下同。

④ 《胡宗南日记》(手稿),1942年4月10日,台北,“国史馆”藏,下同。本文所引日记均为“国史馆”编修陈佑慎兄提供的抄件。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516页。

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第619页。

⑦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144页。

顾政府和军队的需要,竭泽而渔,诛求无已”。<sup>①</sup>

进入1942年后,尽管来自国民党的军事冲突和摩擦减少,但在敌后根据地,日军的大规模“扫荡”仍在继续,对中共形成巨大的压力,以至毛泽东认为:“华北、华中斗争极紧张残酷,要熬过今明两年须费极大牺牲,两年后如能保存现有军队(57万)的一半,全国则保存现有党员(80万)的一半,便是胜利。”<sup>②</sup>

为进一步缓和同国民党的关系,7月7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声明:“中国共产党承认,蒋委员长不仅是抗战的领导者,而且是战后中国建设的领导者。”中共“愿尽自己的能力来与国民党当局商讨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及建设战后新中国的一切有关问题”。<sup>③</sup>同时,毛泽东接连电告各地将领,力避与国民党发生军事冲突,还指示周恩来主动提出:“考虑利用纪念‘七七’机会,找王世杰谈一次国共两党关系问题,并表示愿见蒋介石一谈。”<sup>④</sup>对于即将举行的国民参政会,毛泽东也一改皖南事变时的态度,复电董必武:“为争取国共好转,我们准备出席参政会,不争名额,但以维持原额为宜。”<sup>⑤</sup>

## 二

1942年7月初,蒋介石在布置本月工作时即“预定:一、对俄政策之研究;二、对共方针之检讨,应始宽而后严乎?”<sup>⑥</sup>中共“七七宣言”发表后,自然引起蒋介石的重视。对于中共表示出的善意,蒋介石明确今后“解决共党问题,用政治方法;此为内政惟一焦点,亦惟一之时机,但不宜过急”。同时确定“对共党交涉方针”：“以军令政令统一为前提”的“交涉方针”。<sup>⑦</sup>两天后他约见周恩来,指定张治中和刘斐同中共重开谈判。8月13日,蒋介石再次召见周恩来,表示:想好好解决国内问题,并主动提出他一星期后要赴西安,希望转告毛泽东,想同毛在西安会晤。

蒋介石此时赴西安最主要的任务是解决新疆问题。苏德战争爆发的最初一年,苏联损失惨重。盛世才刚好利用这一时机逐渐由亲苏转向重庆。这为蒋介石彻底解决新疆问题提供了有利时机,同时也引起了苏联人的警惕。7月9日,苏联驻华大使在会见蒋介石时,还企图挑拨盛世才与蒋的关系。蒋在当天日记中写道:

四时俄大使来见,特送其外交部长致盛世才之函件内容,交余辩明,对盛弟之暗杀,非俄国驻新官吏所为,并指摘盛在新逮捕行政干部为不当,宣布盛历次要求俄国在新实行共产及其阴谋叛国之证据,而其函中则特提中俄之邦交,此为其对新疆有关文件第一次之表示也。余对此函决置之不理,暂观其以后之变化何如。<sup>⑧</sup>

两天后,蒋介石收到第八战区司令朱绍良转来的盛世才复函,“以及彼与俄一切秘密交涉与经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3—894页。

② 《毛泽东致周恩来电》(1942年6月13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386页。

③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解放日报》,1942年7月7日,第1版。

④ 《毛泽东致周恩来电》(1942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389页。

⑤ 《毛泽东致董必武电》(1942年7月6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391页。

⑥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2年7月2日。

⑦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2年7月10日、19日。

⑧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2年7月9日。

过详尽无遗,于是俄国在新疆全部阴谋根本暴露”。<sup>①</sup>13日,蒋介石确定对新疆方针:“第一保全盛之地位;第二使俄不恼羞成怒,留有回旋余地。”同时确定“注意”事项两点:“一,新疆问题应先防制俄共鼓动新疆各地之暴动,乘机驱盛……二,俄倭战争如终于不起,则我对新疆问题与计划亦照预定程序实施也。”<sup>②</sup>

由于苏德战争的爆发,苏联一时无力东顾,被迫向中国有所让步。7月18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新疆问题处置方案,穷数日心力,始定方针,对俄态度以不引起其嫉恶为主。”<sup>③</sup>蒋介石的努力终于有了圆满的回报,他在年底的“全年总反省”中曾愉快地记道:

新疆省主席兼督办于七月间公开反正,归顺中央,效忠党国,而河西走廊马步青军队亦完全撤退于青海,于是兰州以西,直达伊犁直径三千公里之领土,全部收复,此为国民政府成立以来最大之成功。其面积实倍于东北三省也。此不仅领土收回而已,而新疆归城中央以后,我抗战之后方完全巩固,倭寇更无意消灭我政府,而俄国与中共之态度亦大转变,不敢为我抗战之害,此非上帝赐予中华民族之恩泽,决不能致此也。总之,本年外交、内政与军事、经济皆在极端变动之中,而于外交与内政收获为最大。<sup>④</sup>

为了确保新疆问题的彻底解决,8月间蒋介石又亲赴西安布置。但他此时仍担心苏联因素而不敢直接到新疆当面招抚盛世才,“以迪化机场已有俄国之驱逐机驻地也,最后决由妻代我赴新传达意旨,以壮盛胆”。<sup>⑤</sup>事后蒋介石还盛赞“吾妻独飞迪化,以安盛氏内向之心,尤为难能也”。<sup>⑥</sup>同时,蒋介石还想利用此次西北之行,借缓和与中共的关系来消除苏联的猜忌。为此,他主动向周恩来提出要求,在西安会见毛泽东。

周恩来同蒋介石会谈后立刻致电毛泽东,分析了蒋介石约见毛泽东的意图,“在态度上还看不出有何恶意,但在其初步解决新疆及回回问题之后,他又自己北上布置,其目的未可测”。周提出两个办法供中共中央选择:一是毛泽东称病,以林彪为代表到西安见蒋介石;二是要求蒋带周恩来到西安,然后由周飞延偕一人(林彪或其他负责人)回西安见蒋。周恩来估计前一个办法可行,后一个办法不易得到蒋介石的同意,除非偕同而来的是朱德。<sup>⑦</sup>

中共中央采纳了周恩来的第一个办法。8月17日,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复周恩来电:“毛现患感冒,不能启程,拟派林彪同志赴西安见蒋,请征蒋同意。如能征得蒋同意带你至西安,你回延安面谈一次,随即偕林或朱赴西安见蒋则更好。”<sup>⑧</sup>

但这并不是毛泽东的最终意见。18日,毛泽东出席政治局会议讨论国际国内形势,会议认为“丘吉尔和斯大林在8月12日至15日进行了会谈,讨论关于建立第二条战线问题。在这种国际形势下,中国局势有好转可能,即亲苏、和共、政治改良”。为此,毛19日致电周恩来表示:“依目前局

①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2年7月11日。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2年7月13日。

③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2年7月18日。

④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2年,“年底总反省”。

⑤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2年8月19日。

⑥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2年9月30日,“本月反省录”。

⑦ 《周恩来致毛泽东电》(1942年8月14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第605页。

⑧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周恩来电》(1942年8月17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397—398页;另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第605页。

势,我似应见蒋。”并明确表示:“关于我见蒋,中央亦尚未做最后决定。”<sup>①</sup>但周仍认为:目前蒋介石虽然有用政治办法解决国共关系的意向,但具体问题尚未涉及,对共产党的压迫毫无减轻,会晤地点又在西安,因此觉得蒋毛会面时机并不成熟。当天,他致电毛泽东建议:“最好林或朱先打开谈判之门,如蒋约林或朱随其来渝,亦可答应,以便打开局面,转换空气;一俟具体谈判有眉目,你再来渝,便可见渠。”<sup>②</sup>22日,政治局召开专门会议,“讨论毛泽东同蒋介石会谈问题,决定先派林彪去,看情况再定”。<sup>③</sup>

25日,毛泽东在修改一份党内通报国际形势及国共关系的文件时,特意加了几段话,其中有“由于缅甸失陷,西南国际通路断绝,迫使国民党不能不注意西北国际通路,并与苏联增强外交关系……这亦是对国共关系避免军事解决改取政治解决的重要原因……特别是今年‘七七’宣言,重申我党拥蒋合作方针,这不能不起促进好转的作用”。为此,毛泽东仍感到有必要见蒋介石。此后一周间,他多次致电周表示:“蒋到西安时,决先派林彪见蒋,然后我去见他。依目前国际国内大局,我去见蒋有益无害,俟林彪见蒋后即确定我去时间。”<sup>④</sup>“乘此国际局势有利机会及蒋约见机会,我去见蒋,将国共根本关系加以改善。这种改善如果做到,即是极大利益,哪怕具体问题一个也不解决,也是值得的。蒋如约我到重庆参加十月参政会,我们应准备答应他……林彪准备在蒋电约后即动身去,我则在林去后再定去西安的日期”。<sup>⑤</sup>

周恩来仍坚持认为毛蒋会面“时机尚未成熟”,蒋对人“包藏祸心”,他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全面阐述了他的看法和建议,电文写道:

我认为见蒋时机尚未成熟。一,蒋虽趋向政治解决,但他之所谓政治是要我们屈服,绝非民主合作;二,蒋对我党我军的观念仍为非合并即大部消灭;三,蒋对人的观念仍包藏祸心(即打击我党领导,尤其对毛,西安事变后尚想毛、朱出洋,时至今日犹要叶挺太太劝叶悔过自新,吾屡次请回延不理,此次我在电答时提到愿回延接林或朱出来亦不许),因此可说他对我党我军及民主观念并无丝毫改变。

次之,在局势方面,并非对我有利:一,蒋对国际局势的看法,一面承认日寇有续攻中国可能,而英美一时无大力援华,且反内战,但何(应钦)等却看到苏联今日处境需要对华让步,英美亦须中国拖住日本,他正好借此依他的想法解决西北及国内问题;二,中共“七七”五周年宣言,本是我党历年主张的发展,而他却认为由于苏联让步,中共亦不得不屈服;三,毛出为谋改善根本关系,而蒋则可利用此机会打击地方和民主势力,以陷我于孤立。

因此,蒋毛见面的前途可能有两个:一,表面进行得很和谐,答应解决问题而散;二,约毛来渝开参政会后,借口留毛长期住渝,不让回延(此着万不能不防)。若如此,于我损失太大。我们提议林出,勿将话讲死,看蒋的态度及要解决问题如何,再定毛是否出来。<sup>⑥</sup>

经过反复磋商,毛泽东最终接受周恩来的意见。9月14日,林彪从延安动身前往西安。为促

① 《毛泽东致周恩来电》(1942年8月19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398页。

② 《周恩来致毛泽东电》(1942年8月19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第606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399页。

④ 《毛泽东致周恩来电》(1942年8月29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00页。

⑤ 《毛泽东复周恩来电报》(1942年9月3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01页;另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第606页。

⑥ 《周恩来致毛泽东电》(1942年9月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第606—607页。

成林彪同蒋介石的谈判,第二天毛泽东分别致电在前线的陈毅、李先念、朱瑞等,指示:“目前已至恢复国共谈判时期……凡可避免的国共摩擦,均须避免。”<sup>①</sup>

恰在此时,陕北发生十年未有的大雨,山洪暴发,路面被冲坏。林彪到西安时,蒋介石已回重庆。蒋介石在西安期间还特别在意“共党林彪之不来何耶?”可见,他对与中共的会谈还是有所期待的。<sup>②</sup>直到10月13日,林彪到达重庆后由张治中陪同会见蒋介石。根据周恩来两周后致电毛泽东报告:林彪提到“毛甚愿见蒋,惟适患伤风未来”。蒋即问毛好。蒋介石对林彪的前几句话表示有兴趣听,但一听提到内战危险,便不耐烦,频频地看手表,约林彪在走前再谈。<sup>③</sup>

查国民党方面的记录,整个会谈期间,蒋介石只有简单几句问话,大多是林彪向蒋汇报。会谈时,蒋介石首先问道:“汝此次来渝,毛润之先生有何意见转告余否?”林彪即答:“我未动身以前,延安方面接得校长电报,毛先生即提出中共中央会议讨论,并约我数度谈话,其所指示者,大抵系根本问题——如中共对于抗战建国之观察,与国内统一团结问题,以及对于委座之期望等,今天晋谒对此诸问题,谨面呈梗概。”随后林彪谈了中共对国际、国内局势的看法,明确表示:“此次余离延安来重庆时,毛先生一再告余,今后吾两党‘应彼此接近,彼此相同,彼此打成一片’,以求现在能彻底统一,更求将来能永远团结。此三句口号已成为中共普遍成熟之思想。”最后谈到内战的危险时,林彪分别“就中国之社会、地理、经济与军事各方面而论,皆希望中国从此能统一团结,而不可发生内战”,并表示:“此为中共之观察,特为校长呈明。”最后向蒋转达:“毛先生此次本愿应召与校长会晤,因病未克如愿,以后希望两党能互相派人来往。”而蒋介石只表示:“在汝离渝以前,余再定期召汝谈话。”<sup>④</sup>

全部会谈记录近五千言,其中蒋介石的问话不到百字,林彪在回答中共意见时,曾三次提到“彼此接近,彼此相同,彼此打成一片”的方针。而蒋介石对会谈的感受是“林彪奉其共党之命来见,幼稚可叹”。<sup>⑤</sup>此后两天,蒋介石明确处理中共方针,确定为:“共党之对策,以要求其先将军令、军政之统一为先决条件。”“此时对共党进行政治谈判,使之和平归诚也”。<sup>⑥</sup>

毛泽东最初对同蒋介石的会谈寄予了一定的期望。就在林彪动身赴西安的第二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向他分析道:

国内关系总是随国际关系为转移。第一次反共高潮发生于德苏协定、苏芬战争及英美反苏时期。第二次反共高潮发生于德苏协定继续存在、英美苏关系仍未好转而轴心则成立三国同盟时期。自苏德战起,英美苏好转,直至今天,国共间即没有大的冲突。这个时期,又分两段,在英美苏未定具体同盟条约及滇缅路未断以前,蒋的亲苏和共决心仍是未下的;在此以后,他才下这个决心。<sup>⑦</sup>

林彪见蒋介石后两周,毛泽东仍不放弃亲自与蒋会谈,并致电周恩来转林彪:“第一次见蒋时

① 《毛泽东致陈毅等电》(1942年9月1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02页。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2年9月11日。

③ 《周恩来致毛泽东电》(1942年10月27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第607页。

④ 《蒋委员长召见第一一五师师长林彪谈话记录》(1942年10月13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5编,“中共活动真相”(4),第236—242页。

⑤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2年10月13日。

⑥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2年10月15日、17日。

⑦ 《毛泽东致周恩来电报》(1942年9月1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02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传》,第599页。

是否谈到了我见蒋的问题,如未谈到,第二次见蒋时请提出,征询他关于会面的时间、地点等。”<sup>①</sup>

与此同时,国民党为了缓和与中共的关系,还借陕北遭十年不遇的水灾之机,特派中央赈济委员会委员郑延卓携款30万元赴延安救济。毛泽东相当重视郑延卓的来访,同他会谈两次,“谈到边区,我(指毛泽东——引者注)说区域维持现状,人员加以委任。谈到军队,我说应编四军十二师。此外停捉停打停封,发饷发弹发药,也说到了”。<sup>②</sup>此时,毛泽东对缓和与国民党的关系充满希望,特致电转告在前线的彭德怀:“国共关系好转,边区可能取得合法地位。林彪已去重庆,国民党派郑延卓来延安。”<sup>③</sup>毛泽东并应郑之请亲笔致函蒋介石,语气相当客气:

前承宠召,适染微恙,故派林彪同志晋谒。嗣后如有垂询,敬乞随时示知,自当趋辕聆教。郑委员延卓兄来延,宣布中央德意,惠及灾黎,军民同感。此间近情,已具告郑兄,托其转陈,以备采择。郑兄返渝之便,特肃寸楮,已致悃忱。敬颂勋祺不具。<sup>④</sup>

郑延卓在延安“参观了许多地方,接谈了几十个人。据称:观感与外边所见两样”。<sup>⑤</sup>回重庆后,他向负责与中共交涉的何应钦汇报时提到毛泽东表示:“中共不一定要保持武力,惟目前如果没有武力,则党必不能存在。党依附军队而存在,乃不可掩饰之事实。但中共能取得党的合法地位,则可放弃军队。”郑还特意分析道:“中共之所以要求扩军,其原因不外:一,年来奸伪军之发展过快,毛泽东亦有此承认,并承认其扩军已达饱和点,以故统驭上颇感困难;二,奸伪在边区之军队,多系有名无实,整训不易,故此急于要求编军。”<sup>⑥</sup>而同日,国民党中执会秘书处向中常会汇报郑氏出访延安时的内容,却有很大出入。其汇报共七点,内容大致同林彪与蒋介石的谈话相同,惟涉及上述与毛泽东的谈话时,则改为:“目前国民党保持强大军队,如共产党将所有军队取消,则全部党员将被解体,希望中央能予以公允整编。至政令、军令统一问题原则上接受,如所发命令中含有毒素,则不能接受。”<sup>⑦</sup>

12月24日,林彪、周恩来在重庆同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张治中举行正式谈判。林彪出示中共四项条件:“(一)在允许合法化条件下,可同意国民党到边区及敌后办党。(二)军队要求编四军十二师,新四军在内。(三)边区可改为行政区,人员与地境均不动(地境不动一点请注意)。(四)黄河以南部队,确定战后移至黄河以北,但目前只能做准备,不能实行移动,此乃完全为事实所限制,绝对无法移动。”<sup>⑧</sup>并声明:“如认为这四条可谈,请留林继续谈,如相去太远,则请蒋提出具体方针交林带回延安商量。”张治中逐条记下后答应报蒋介石。<sup>⑨</sup>

随后,张治中向蒋介石逐条分析了中共四项要求的利弊得失,并总结道:

一、判断林、周此次所提四项要求,系根据本党所示宽大政策而来,其目的在对于党政军各方面皆欲取得合法地位,不能认为有悔祸诚意。

① 《毛泽东致周恩来并转林彪电报》(1942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09页。

② 《毛泽东致周恩来林彪电报》(1942年12月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16页。

③ 《毛泽东致彭德怀电报》(1942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15页。

④ 《毛泽东致蒋介石函》(1942年12月1日),此函原件影印件在台北“国史馆”阅览大厅墙柱上长期展览,以“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用笺”毛笔书写,共两页。另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16页。

⑤ 《毛泽东致周恩来林彪电》(1942年12月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16页。

⑥ 《郑延卓在延安与毛泽东谈话摘要》(1942年12月21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毛笔抄件,特字029/6—20。

⑦ 《毛泽东等与郑延卓谈话详情》(1942年12月21日),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毛笔抄件,特字029/6—16。

⑧ 《中共中央书记处复周恩来林彪电》(1942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17页。

⑨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557页。



二、本党宽大政策之真正作用,应为瓦解中共,绝非培养中共,故林、周所提四项,不能作为商谈基础。

三、如必须与之商谈,似可冷淡置之不予答复。

四、如须商谈则应另以下列原则为商谈基础:

(1)中共不应有军队,其军队须由各战区长官各就驻在于战区区内者,切实点验编遣整训,并指挥其作战,不得再行自立系统,及保留变相武装。

(2)中共不应在各地地方擅自非法政府,其各地非法政治组织须一律取消,由各该省府派员接管,恢复原有行政系统及区划。

(3)以上两项办到后,始可予中共以合法地位。假定上述原则中共不肯接受,则不必强求商谈,尽可加紧防制,使其停止非常地位,以期动摇其内部,增加其苦闷,俾便将来之解决。

五、如采取敷衍态度,似可告以此事牵涉太多,并令林彪先行回去。<sup>①</sup>

由于国共双方所求差距过大,正如张治中所建议,国民党对谈判始终采取“冷淡置之不予答复”的态度。而毛泽东此时还对国共关系的改善寄予一定的期望,不断向各根据地发出指示:“如有摩擦事件,必须先经报告批准,不许自由行动。”<sup>②</sup>并指示林彪:谈判方针,“可以答应以‘皓电’为谈判基础”。<sup>③</sup>3月27日,面对国民党蒋鼎文、庞炳勋部向八路军进攻一事,毛泽东和朱德复电彭德怀:“蒋、庞挑衅以事先设法消弭,不致引起冲突为上策,因坏人故意寻衅,此时引起较大冲突,对我极为不利。仅在万不得已时,才可在严格自卫原则下,给向我进攻之部队以部分打击。”<sup>④</sup>而针对国民党韩德勤部主动进攻新四军陈毅部时被新四军俘虏,毛泽东指示陈毅可同韩德勤订立一合作抗日密约后,礼送出境,发还人枪,并划定彼此活动区域。<sup>⑤</sup>

3月28日,周恩来、林彪与参谋总长何应钦举行会谈。何首先向中共提出江北韩德勤部的问题。周恩来因已获知延安态度,当即回复:“当敌伪对苏北进行‘扫荡’时,韩主席曾派人与陈毅商讨协同抗敌办法,陈亦认为必要,故结果极为圆满,陈毅与韩主席年来相处甚善,韩主席已划定地区为‘新四军’驻地。”并主动承诺中共“允将人械全部归还”。随后,周恩来提出:“关于二十九年总长代皓电所提示各点,原则上我们已接受,不过请中央考虑者,即时间与数量问题耳(“时间”系指开赴黄河以北时期,“数量”系军队扩编数量——引者注)。”何应钦回答道:“关于这一点,现在情形较前略有不同,俟我请示委座后再告。总之,我们的大前提,要彻底团结共同抗敌。”林彪即从团结角度出发,表示:“延安方面,很希望两党问题解决,彻底合作,彼此在现阶段能做到如何程度,即做到如何程度,如此则对整个问题,多少有些促进与改革。”何应钦回复道:“所请各点,待我请示委座后结果如何,由张部长转告。”<sup>⑥</sup>

① 《林彪周恩来向张部长治中所提要求四项原文及研究意见》(1942年12月26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5编,“中共活动真相”(4),第245—246页。

② 《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致各战略区统战工作指示》(1943年2月7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26页。

③ 《毛泽东复周恩来林彪电》(1943年2月12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27页。“皓电”即指1941年7月19日国民党在皖南事变后提出的解决国共关系的“中央提示案”。

④ 《毛泽东朱德致彭德怀电》(1943年3月27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31页。

⑤ 《中央书记处与陈毅往来电报》(1943年3月27日、29日、4月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31页。

⑥ 《三十二年三月二十八日何总长与周恩来林彪谈话记录》,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5编,“中共活动真相”(4),第249—251页。

当晚,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据敬之与恩来谈话情形,中共态度似未比前恶劣,对于其兵劫韩德勤之举动,亦尚未承认也。”“中共不像有意挑衅,自美国副总统对俄警告之发表以后,俄对利用共党捣乱各国内政之阴谋或有忌惮,此乃最大原因”。<sup>①</sup>为此,蒋介石在何应钦的正式报告上批示:“必须其对中央军政军令,有服从事实之表现,方可与之具体谈话,照现时情形无从谈起,如其不来谈,则可不必要再复。”<sup>②</sup>而毛泽东收到周恩来的报告后,也大致明确了国民党的态度,不再对蒋介石抱有希望。30日,毛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国共谈判问题,决定:“周回林留,或周、林均回,仍须向彼方正式提出,如彼不允,则林独回。”<sup>③</sup>4月3日,毛泽东再次复电周恩来,指出:“种种迹象使我们怀疑国民党欲改变十中全会政策,寻找借口停止谈判,并向我们作进攻的行动。”<sup>④</sup>至此,国共谈判陷入僵局。

### 三

1943年5月20日,在延安,毛泽东的俄文翻译师哲将一份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的电报交毛,电报内容是通报共产国际主席团决定两天后宣布解散共产国际,为此征求毛和中共的意见。毛泽东看后兴奋地说:“我就主张不要这个机构。”<sup>⑤</sup>

共产国际之所以主动解散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斯大林面对苏德战场上的巨大压力,迫切希望英美尽快在欧洲大陆开辟第二战场,而向英美所做的妥协。<sup>⑥</sup>6月10日,共产国际正式宣告解散。7月9日,英美联军在意大利西西里登陆。

共产国际的突然解散,打破了国共两党之间保持了两年多的相对平静状态。对毛泽东和蒋介石来讲,共产国际的解散,都是求之不得的意外惊喜。

面对共产国际的解散,毛泽东不但没有失望,反而是信心百倍。一方面通过精兵简政和大生产运动,边区政府的经济压力减轻;二是通过整风运动,确立了毛泽东的绝对领导权;三是共产国际的解散,使中共彻底摆脱了束缚,可以全面贯彻独立自主方针,统一意志,调整内部,而无须再看共产国际的脸色行事。5月26日,中共中央正式答复共产国际,明确表示同意解散共产国际,并告之“自即日起,中国共产党解除对于共产国际的章程和历次大会决议所规定的各种义务”。<sup>⑦</sup>同时,毛泽东提醒党内干部:“对党内政策,一是整顿三风(应坚持一年计划);二是审查干部(清查内奸包括在内);三是保存干部(送大批干部来后方学习)。如能实施上述各项,不犯大错,我党即可立于不败之地。”<sup>⑧</sup>

尽管毛泽东在抗战爆发后即逐步确立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但真正从组织上全面行使权力,是在共产国际解散前后。经过第一阶段的延安整风,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调整中央领导机构,推举毛泽东为政治局主席、书记处主席,目的是“使中央机构更加简便与灵活,使事权更

①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3年3月28日。

② 《〈参谋总长何应钦呈蒋委员长报告与周恩来林彪晤谈情形〉批示》(1943年4月2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5编,“中共活动真相”(4),第247页。

③ 《中央书记处复周恩来林彪电》(1943年3月30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32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564页。

④ 《毛泽东复周恩来电》(1943年4月3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32页。

⑤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228页。

⑥ 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33页。

⑦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40页。

⑧ 《毛泽东复彭德怀电》(1943年6月1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43页。

加统一与集中,以达到更能增强中央的领导效能”。书记处是根据政治局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在组织上服从政治局,但在政治局方针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书记处会议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权”。<sup>①</sup> 尽管在中共七大召开以前,毛泽东暂时无法改选政治局委员中仍占多数的“国际派”,但他正式从组织程序上获得了最高领导权。就在取得这一“决定权”的当天,由毛泽东负总责的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发出《关于整风学习总结计划》,明确决定:“学习文件与工作检查四月底结束,审查工作可转入学习结束后之下一阶段,作为今年一年的中心工作之一。”<sup>②</sup>两周后,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此次整风的一个重点就是“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亦即“审干运动”。毛泽东认为:“整风是思想上的清党,审干是组织上的清党。”<sup>③</sup>“审干运动”的全面展开,是在共产国际解散不久,其中一重要标志就是这年7月15日康生发表的《抢救失足者》的报告。

在此期间,蒋介石也再次获得国家元首——国民政府主席的桂冠。早在1931年国民党宁粤对峙期间,蒋介石被迫二次下野,辞去国民政府主席,由林森继任,并将主席权限限制为国家礼仪性的职务,届期两年。到1936年元旦,林森已满两任,依法不能再行连任。后因国民党决定于1936年底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因此临时决议将林森的国民政府主席一职延长至宪法颁布之日止。<sup>④</sup>不久全面抗战爆发,国民大会更被无限期延缓。

1943年5月,林森因病不能视事。为此,国民党修正了沿用12年之久的《国民政府组织法》,恢复一项:“国民政府主席因故不能视事时由行政院院长代理之。”<sup>⑤</sup>当年删除此项条款的目的是为了防止蒋介石集权,但12年后的蒋介石早已大权在握,恢复这一条款无任何障碍。8月1日,林森病逝。当日夜间,国民党中常会举行临时会议,选任蒋介石代理国民政府主席。9月,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正式修订《国民政府组织法》,一改主席仅为国家礼仪象征,直接掌握一切大权。修正内容如下:国民政府主席任期由二年改为三年,连选得连任;主席为陆海空军大元帅;五院正副院长由主席于国政委员中提请中执会选任;国民政府主席对中执会负责,五院院长对主席负责。<sup>⑥</sup>从此,蒋介石一人以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身份总揽党政军大权。

同样,面对共产国际的解散,在蒋介石看来也是妙不可言:“莫斯科第三国际宣布解散,此实为二十世纪上半期史之惟一大事,殊为世界人类前途幸福庆也。而吾一生最大之对象,因此消除。此不仅为此次世界战争中最有价值之史实,且为我国革命、三民主义最大之胜利也。”<sup>⑦</sup>但蒋介石在判断上,错误夸大了中共失去共产国际支持后的损失,认为“此后对于国内共产党之方针与计划应加重研讨,是乃对内政策之重要时机”。同时,他又不放心苏联会真正放弃对中共的支持,认为这是“共党国际之改变方式而事实上决非真正解散也”。<sup>⑧</sup>

其实在蒋介石与林彪第一次会谈中,林彪已向他透露中共对共产国际的辩证态度。林彪表示:“中共虽信奉共产主义,但决不能照恩格斯、马克思、列宁与史达林所定之具体办法依样实行……故我党现在主张反对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即不主张将恩格斯、马克思、列宁与史达林的教条,主观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30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第659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31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第662页。

④ 《国民政府主席任期延长案》,《中央党务月刊》第89期(1935年12月),第1027页。

⑤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第十三条第二项修正案》,《国民政府公报》渝字第574号(1943年5月29日),第2页。

⑥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修正案》,《国民政府公报》渝字第605号(1943年9月15日),第1页。

⑦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3年5月31日,“本月反省录”。

⑧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3年5月24日。

地搬到中国应用。”<sup>①</sup>

早在1942年7月,蒋介石几乎同步获得“共党整顿三风二十二种之学术文件,设法检呈研究”。<sup>②</sup>但对中共的整风运动,以及中共与苏联、共产国际的关系,蒋介石始终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的认识,蒋介石得到的情报甚至显示:“密查奸党政治,迭被本党事实粉碎后,毛泽东为掩饰其罪过,并提高干部向心力,曾提出所谓整顿三风,惟奸党为敛财扩军,不得不放种鸦片,并加重税捐,因而三风运动即被发财主义所淹没,并且形成种种内部矛盾。”<sup>③</sup>而毛泽东在多封致周恩来的电报中,屡屡要求大后方的中共党员进行整风学习时,特别强调:“延安学习二十二个文件收到绝大效果,有一万个干部参加此种学习。”“大批青年干部(老干部亦然)及文化人如无此种学习,极庞杂的思想不能统一”。<sup>④</sup>通过延安整风,中共不仅摆脱了共产国际的教条主义影响,还成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从而取得了中共党内思想的高度集中和党的一元化领导。可见,国民党、蒋介石完全不了解整风运动对中共建设的意义和作用。

此时,蒋介石非常渴望日苏关系彻底恶化,才有可能最终迫使苏联放弃对中共的扶持。在这一主观因素的影响下,他再次产生错误判断,认为:“以实际论,倭必攻俄无疑。”<sup>⑤</sup>整个6月间,他反复“研究倭俄交涉内容及动态,几乎穷理究极,精微入神,近日朝夕于兹,梦寐难安,以此实为我国生死存亡之所决也”。<sup>⑥</sup>“研究倭俄交涉内容与动向,一周以来,几乎大部精神全在于此,自觉精思入神,未敢一刻放弃也”。<sup>⑦</sup>“倭之对俄情势似有不得不屈服之苦境,此乃为我国极不利之事,然世界形势变化无常,俄未必被其作弄而与之妥协也”。<sup>⑧</sup>与此同时,毛泽东也清醒地认识到日苏关系深刻影响着国共关系。他在3月政治局会议上曾谈道:“日苏不战是世界局势的一个枢纽,国共关系要看日苏关系的变化。”<sup>⑨</sup>在国民党内白崇禧也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据胡宗南日记载:“与白部长谈话”,“其要点为日苏战时,乘机解决中共”。<sup>⑩</sup>

此外,这段时间蒋介石的另一大工作重心是修改他在3月公开发表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几乎是逐段逐章审校该书。仅6月一个月,蒋在日记中提到“修校中国之命运第二版”<sup>⑪</sup>,就多达16次之多。6月24日:“下午校正中国之命运二版,晚再校中运二版至第七章完。”<sup>⑫</sup>6月30日:“中国之命运第二版稿校正完毕。”<sup>⑬</sup>而涉及中共问题,只谈到两次,一次是“见周恩来、林彪,谈共党

① 《蒋委员长召见第一一五师师长林彪谈话记录》(1942年10月13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5编,“中共活动真相”(4),第239页。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3年7月25日。蒋提到的“二十二种之学术文件”是这年6月7日成立不久的“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通过的决议所涉及的整风文件,会议决议:“按照延安经验,暂时停止其他政治、业务教育及党的历史研究,集中力量研究二十二个文件及检查工作,将整风运动展开到全党。”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385页。

③ 《叛告奸伪整顿三风运动后其表现之种种情况》,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毛笔抄件,特字029/7。

④ 《毛泽东致周恩来电》(1942年6月13日、26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386、388页。

⑤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3年6月10日。

⑥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3年6月12日。

⑦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3年6月13日,“上星期反省录”。

⑧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3年6月30日,“本月自反省录”。

⑨ 《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43年3月16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29页。

⑩ 《胡宗南日记》(手稿),1942年8月5日。

⑪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3年6月17日。

⑫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3年6月24日。

⑬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3年6月30日,“本月反省录”。

事,则心平气和,应对自如,自觉得体”。<sup>①</sup>一次是“对中共应付与方针如计进行,尚能虚心自如也”。<sup>②</sup>

正是在这诸多的错误判断下,自共产国际解散后,蒋介石一度想放弃“政治方式”解决中共问题。6月9日,蒋介石秘密派遣何应钦、白崇禧到西安与胡宗南召开军事会议,策划进攻陕甘宁边区,准备分九路闪击延安。胡宗南抓紧执行,并于7月2日电令所部于十日内完成一切准备,待命行动。<sup>③</sup>

不曾想蒋介石的秘密军事布置,早为中共所侦知。毛泽东紧急致电留守重庆的董必武:“蒋介石调集二十余师兵力包围陕甘宁边区,战事有在数日内爆发的可能,形势极度紧张。请立即将上述情况向外传播,发动制止内战运动。特别通知英、美有关人员,同时找张治中、刘斐交涉制止,越快越好。”<sup>④</sup>7月7日,毛泽东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分析指出:国民党“企图利用德苏及日苏的紧张关系,估计日本会进攻苏联,利用共产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军事压迫、政治阴谋,企图解散中共、取消边区、取消八路军的反动行为。我们过去两年采用不刺激国民党的‘和国’政策,保持了两年多的比较平静,是正确的。现在情况变化,就不适用了,而要采用以宣传对付他们的反共宣传,以军事对付他们的军事进攻。”会议决定在“拥护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的原则下,集中力量痛斥国民党反共分子的反动政策与挑起内战、破坏抗日团结的‘第五纵队’的行为”。为此,中共于7月9日在延安公开召集三万多人集会,发表通电,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同日,毛泽东还以朱德的名义起草致蒋介石、何应钦、胡宗南的通电,要求制止进攻。<sup>⑤</sup>随后,中共展开了一系列的强势宣传战,令蒋介石颇为被动。

犹豫不决的蒋介石,最终放弃了闪击延安的计划。一方面是他期待的苏日冲突没有实现。7月2日,就在胡宗南闪击延安布置妥当之时,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接倭谋与俄根本妥协之报,顿觉忧郁,纬儿不知我心忧郁,而余亦不愿以余之忧心告彼以增其代忧,此乃父之爱子之心,非可以言语形容。”<sup>⑥</sup>另一方面,美国总统罗斯福正在邀请蒋介石参加中、美、英、苏的“四巨头”会议,而“九日盟军在西西利岛登陆成功,对欧第二战线从此开始矣”。<sup>⑦</sup>蒋介石不得不考虑盟国的因素,最终决定撤军。

7月13日,毛泽东致电在前线的彭德怀:“我宣传闪击已收效,更因延安紧急动员,迫使蒋介石不得不改变计划。十日蒋介石令胡宗南停止行动,十一日蒋、胡均复电朱德声明无进攻意,十二日胡下令开始撤退一个师及两个军部,内战危机似可克服。”<sup>⑧</sup>

此时,已由重庆准备撤回延安的周恩来、林彪一行刚好于9日到达西安,经数日与胡宗南接洽,13日周恩来同林彪致电毛泽东表示:“根据连日接洽及研究结果,蒋令胡宗南准备进攻尚未进入行动阶段,中央考虑戒备有必要,但延安民众大会通电‘刺激太甚’,重庆、西安宜暂缓印发。”<sup>⑨</sup>对此,毛泽东的态度是截然相反,同日致电西安指示:“为击破国民党的无耻反共宣传计,你们仍旧将延安民众大会通电密发社会各方,不得停止不发。”<sup>⑩</sup>

①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3年6月7日。

②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3年6月13日,“上星期反省录”。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45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49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51—452页。

⑥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3年7月2日。

⑦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3年7月11日。

⑧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57页。

⑨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第572页。

⑩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56页。

随后,毛泽东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一场巨大宣传攻势,《解放日报》发表社论,不点名地批判蒋介石新近出版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今年三月,大后方出版了一本中国法西斯主义的‘经典’”,“这本‘经典’的中心思想,一句话说完,就是要在两年内解决中国共产党,以便实行法西斯主义”。毛泽东同时致电中共中央南方局,要求将陈伯达所写《评〈中国之命运〉》一文“印译为中英文小册子,在中外人士中散发,并搜集各方面对此文的反应”。<sup>①</sup>这种对蒋介石的半公开批判,是自抗战爆发以来从未有过的现象。正是在这一时期,王稼祥、刘少奇先后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很快为中共全党所接受。<sup>②</sup>

事实上,蒋介石内心深处从没有彻底放弃武力解决中共的意图。对中共的此番宣传战,蒋介石恨之入骨,他在日记中写道:“共匪七七以后之言论可谓恶贯满盈……除武力之外,再无其他方法可循,如此只待其时而已,但时间未到,惟有十分隐忍……不可小不忍以乱大谋。”<sup>③</sup>但此后他在研判中共问题时,又多次出现错误,甚至认为毛泽东的此轮宣传战,是为了加害正由重庆返回延安途中的周恩来等人。7月28日,他在日记中写道:

研究共匪七七至七月十二日在延安《解放日报》所发表之社论,对中央污蔑诬辱为其最穷恶之挑衅行动,使中央不能不向之进剿者,其最大阴谋乃在为害周恩来乎?以周在此期间正在由重庆往延安,途中经过西安之时,毛匪以为中央见此论调,必一面进剿,一面扣周也,可知至之忘周已极,故对共匪此次挑战言行决以犯而不较处之,并使周安全回到延安,试观其内部如何变化也,以后对共匪方针只有促成其内部变乱,乃此用兵进剿之策略胜过千万矣。

8月1日,蒋介石又记道:“俄国请求准其飞机往延安,接其在共党根据地之记者与医生回俄,并声明不再派人替代,此事于我国与俄之关系最大,比俄撤回新疆之军队为尤重要,可知俄国对中共毛泽东等所为之绝望,而其内部对俄之态度,双方冲突,亦更明朗共匪内讧与自残之期必不远矣。”<sup>④</sup>

查蒋介石日记,在准备闪击延安之前,他日记中几乎只字不提此事。而在此后,特别是8月间,蒋介石倒是不断自我反省:

俄国一方面发表中国局势严重,将有内战之消息,一方面对美国政府当局造谣宣传,称我中央限共匪于八月十五日以前归顺中央,否则即欲讨伐之说,以耸动美国当局。彼美参长麦歇尔果被其煽动,电询子文以此事之究竟,劝我勿用武力,可知俄国谋我之初,与其所谓解散共产国际者,皆欺世妄诞,共匪之为俄作伥,其罪恶甚于汉奸十倍也,可痛。(8月11日)

共匪之猖狂,尽其谣诬之繁兴,俄国之保护共匪,及其对美宣传之阴谋,现时之发泄,是我国之益,而非我国之害,否则第三国际解散以后,俄对共匪之关系究竟如何,无法穷究也,有此经验,更觉共匪之制裁,非在欧战未了之前解决,则后患更大也。(8月13日)

对共匪之计划,到此不能再事被动消极,顾忌太多,长此以往,则我愈近就退让,则匪更放

<sup>①</sup>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58—459页。

<sup>②</sup> 1943年7月6日,刘少奇在《解放日报》发表《清算党内孟什维主义思想》,提出:“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并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去清算党内孟什维主义思想。”两天后,王稼祥在《解放日报》发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什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

<sup>③</sup>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3年7月24日。

<sup>④</sup>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3年8月1日,“上星期反省录”。

肆猖獗。(8月20日)

注意:1. 剿共预想之变故,甲、持久不能解决;乙、倭寇进攻洛阳西安;丙、俄国干涉侵犯新疆;丁、共匪逃窜方向;子、晋西;丑、陇东;寅、宁夏;戊、我军反攻倭寇时之扰乱我后方,此节如我不剿共,则共亦仍欲扰乱我后方也。(8月24日)

经过一个多月的反省,至8月底,蒋介石又信心十足地认为自己“尤其对俄国外交国际形势与对共匪方针,皆能获得一缜密考虑之结果,实为个人学力之进步,颇足自慰”,并对自己在7月间的行为反省到“上月之判断,是余太浅薄之过也”。<sup>①</sup>

为此,蒋介石特意召见胡宗南继续布置对中共的作战计划。据胡宗南日记载:9月4日“委座召见,问对延安作战意见。当答以主力由宜川、洛川间直取肤施,以一部攻取三边,以后包围而歼灭之。委座认为现时进攻不甚相宜,因其有备”而再度放弃。<sup>②</sup>两天后国民党召开的五届十一中全会(9月6—13日),迫于国际、国内的压力,蒋介石最终改变对中共武力解决的态度:

对共匪不用武力讨伐而不能不用法经制裁之理由:甲、匪部干部之间及其上下已离心离德,只要我持之以久,匪必不待我攻而自灭,若我讨伐则反促其团结;乙、对匪用兵无异割鸡而用牛刀,若果持久不能解决,徒长匪焰,而与敌寇以复活之机;丙、今日之匪腐化专制,骄侈□□,已不如江西时代之共匪可比,彼绝无再扰窜之勇气。<sup>③</sup>

此时,蒋介石在解决中共问题时又回到了“政治解决”的老路上,甚至错误地判断中共内部会分裂,“不待我攻而自灭”。他只是在一些枝节问题上发了几句狠话:“对共处分时应准备之点:甲、《新华日报》之监视;乙、共籍参政员资格之取消;丙、各地十八集团军办事处之封闭;丁、对共匪在渝之电台与秘密通信机关及其人员之处置,应重加考虑。”<sup>④</sup>最终,蒋介石在全会闭幕式上表示:“中共问题是一个纯粹的政治问题,因此应该以政治方式来解决。”<sup>⑤</sup>

#### 四

在1942—1943年的国共关系发展史上,深深留下了毛泽东和蒋介石两人的烙印,也充分体现出他们不同的个性和行事风格。

不可否认,抗战时期毛泽东和蒋介石都是中国最出色的战略家。他们对整体战略的判断,在很多方面是一致的。特别是在国际问题上,双方都有着共同的想法。只是由于他们所处的位置不同,因此在处理国共关系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对于蒋介石来讲,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牢牢把握住了中国抗战胜利的机遇期。1942年元旦,中国同美、英、苏三国领衔签署《联合国宣言》,标志着

①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3年8月31日,“本月反省录”。

② 《胡宗南日记》(手稿),1943年9月4日。对于蒋介石闪电击延安的计划,胡宗南在1944年的日记中也曾提到此事。7月5日,他在日记中道:蒋介石说“这次灵宝作战,将我军弱点暴露无遗。侥幸得狠,日军未进。如果日军西进,潼关必丢,西安必丢。关中失守,重庆动摇。中国有灭亡之虞矣!委座言时,声色忽厉忽和,忽顿挫忽激昂。最重要之语为:‘你看现在大家谁还看重你?假使上半年如剿赤匪,你一定失败。届时影响之大,不知如何也!’”

③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3年9月8日。

④ 《蒋介石日记》(手稿),1943年9月9日。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469页。

中国正式加入同盟国阵营;1943年初,中国分别同英、美两国签订平等新约,废除了近代以来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不平等条约;同年底,蒋介石出席开罗会议,确立了战后中国的国际地位,并从法理上明确战后收复台湾、东北等日本从中国掠夺的领土。正因为如此,蒋介石在处理国共关系时,一定要围绕着国际背景来观察处置。在蒋介石看来,国共关系从属于国际关系的演变。而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战时国共关系则是头等大事。尽管毛泽东也同样关注国际局势的变化,但在处理国共关系时,毛泽东则是最大限度地利用国际局势变化,服从、服务于国共关系的改善和发展。

考察这一时期的国共关系,虽然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面对日本侵略的扩大和反法西斯同盟的形成,双方都有合作的需求,但各有怀抱。毛泽东期望的是在民主的旗号下求得中共政权、军队合法化;蒋介石则借国家统一的旗号,强调政权、军队大一统。此时在重庆的周恩来,对蒋介石的判断更为准确:“他之所谓政治是要我们屈服,绝非民主合作。”正是因为周恩来体会到双方的实际差距,相信谈判不会有实质性的结果,因此不建议毛泽东同蒋介石会晤。而当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特别是当共产国际解散后,立即放弃同国民党的谈判。同时,蒋介石虽想借此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但作为同盟国的一员,也不得不考虑美、英、苏三国的态度,而不敢擅自对中共大打出手。在国际战略方面,毛泽东和蒋介石最大的不同之处是,毛泽东更强调独立自主。抗战时期,毛泽东成功摆脱了曾对中共有过巨大帮助而又有着强烈束缚的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影响;而蒋介石则更多地将中国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同盟国身上,过度依赖于美、英政策的转变,相对较少关注自身的发展壮大。甚至在处理国共关系时,希望苏日开战,借机武力解决中共问题。

至于从具体的国共关系的视角考察,无论是宏观战略还是微观战术,毛泽东都远胜于蒋介石。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这些耳熟能详的语句,都是毛泽东在处理战时国共关系时总结出来的炉火纯青的艺术,是他在深刻反思第一次国共合作和十年内战血与火的洗礼中产生的,并将其发挥得淋漓尽致,充分做到了“有理、有利、有节”。<sup>①</sup> 时机尚不成熟,绝不轻举妄动;时机一旦成熟,绝不轻言放弃;时局发生变化,迅速做出调整,绝不恋战。

而蒋介石在处理国共关系时,尽管在战略判断方面与毛泽东相似,但他所做出的决断和战术布置,却僵硬保守,不善随机应变,更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犹豫不决。加之国民党整体的组织、动员力量远远落后于共产党,因此国民党始终处于被动地位。

当1944年欧洲战场节节胜利之时,国民党却面临着—场豫湘桂大溃退,引起全社会的人心巨变。此时中共在调整国共关系时,已不再简单地向国民党提出政党合法、军队扩编等问题,而是公开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发表了《论联合政府》,并在开幕式上庄严宣告:“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我们应当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反对另外一种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运。”“我们的任务就是这一个”,为“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sup>②</sup> 由此展开了新一轮国共之间的较量。

[作者金以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马晓娟)

<sup>①</sup> 毛泽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1940年3月11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45、749、750页。

<sup>②</sup> 毛泽东:《两个中国之命运》(1945年4月23日),《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25—1026页。



# The Journal of Studies of China's Resistance War Against Japan

No. 2, 2015

---

## **The Troika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Protracted Resistance: Guerrilla Warfare, Base Area and Regular Army ..... *Huang Daoxuan* (4)**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the CCP insisted on fighting behind enemy lines, successfully achieved the goal of protracted resistance, and accomplished its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For the CCP's protracted resistance behind enemy lines, guerrilla warfare, base area and regular army composed of interactive "troika," and the total war formed by unity of party, government, military and common people was the base of bases. With interaction of various factors, the chain of protracted resistance was formed and operated. The success of the CCP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was a product by trial and error in practice. It did not come easy, and displayed the CCP leader's exceptional height in making strategy and policy.

## **An Abortive Mao Zedong-Chiang Kai-shek Meeting: Re-examination to the Guomintang-CCP Relations from 1942 to 1943 ..... *Jin Yilin* (23)**

After the Anti-Japanese War entered the stage of stalemate, the Guomintang-CCP relations gradually changed from cooperation to friction, and experienced the Guomintang's three anti-Communist campaigns; firstly, Shanxi New Army Incident occurred in December 1939; secondly, Southern Anhwei Incident in January 1941; thirdly, the Guomintang's preparation to strike Yan'an in May 1943. Though the CCP's party history books have many depictions to these incidents, they scarcely notice that in more than two years between the second and third anti-Communist campaigns, the Guomintang-CCP relations were in ease for a time, and the two parties even had closed contacts, and particularly in 1942 Chiang Kai-shek initiatively offered to meet Mao Zedong. Mao Zedong sent many telegrams to Zhou Enlai in Chongqing to talk about the matter, expecting to meet Chiang Kai-shek to discuss the Guomintang-CCP relations. Because of Zhou Enlai's objection, Mao Zedong sent Lin Biao to Chongqing to meet Chiang Kai-shek. In the end, because the expectations of the two parties were sharply different, the negotiation concluded without concrete results. Soon afterwards, with the dissolution of the Comintern, the Guomintang and the CCP began a new round of confrontations.

## **An Analysis of Yamashita Tomoyuki Case—Centered on Press Reports after the Victory of China's Resistance War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 *Han Hua* (39)**

## **Chiang Kai-shek, Huang Fu and the Storm of the Change of Beijing Public Security Bureau Chiefs ..... *He Jiangfeng* (46)**

## **The Truth of the Grass-root Social Control in North China Japanese-occupied Areas—An Exploration to the Xinmin Society in Tong County ..... *Liu Jie* (62)**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the Japanese and puppet authorities in North China established the Xinmin Society to strengthen the control to society and to support the puppet government to administrate. Locating in suburb of Beijing, Tong county was a model county for public order set up by Japanese and puppet authorities, and it was also a model county of the Xinmin Society. The Tong County Xinmin Society helped the puppet government to take organization control, thought